

桂林抗战文化发展研究

郭德钦

(桂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抗战时期,桂林抗战文化得到了蓬勃发展,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抗战文化发展过程中锻造了一支生机勃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积极拓展文化阵地并注重繁荣文化事业,抗战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得益彰。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笔者以为中共无论任何时候都应更加注重先进文化的引导作用,更加注重“文武两个战线”的配合作用,更加充分发挥中共非权力性影响力的渗透作用。

关键词:桂林抗战文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化人

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4)05-0129-06

在中国抗战文化史上,抗战文化得以蓬勃发展并取得卓越成效者非延安与桂林莫属,素有“北有延安,南有桂林”的美称。延安是中国革命的中心,抗战文化得以轰轰烈烈的开展自不必说。研究国统区的抗战文化,重庆是抗战文化中心之一,但是它当时毕竟是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其政治控制和思想控制远比其他地区严重得多。然而,桂林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相对宽松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必然成为当时抗战文化的一支奇葩。正如胡愈之所回忆:“1938年武汉撤退之后到桂林比在重庆还‘自由’些,不像重庆那里国民党公开捕人,广西还文明些,不公开反动。桂系和蒋介石有矛盾……广西地方上政治空气还比较好,出版、宣传都可以适当进行,所以就成为国民党大后方的抗日文化中心。”^[1]这两大抗战文化中心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呼应互动中推动抗战文化运动的有效开展,取得的丰富经验值得研究并借鉴。

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桂林抗战文化发展的首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桂林抗战文化发展的灵魂,桂林抗战文化经过中共南方局和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得以开展和蓬勃发展。

事实上,建设抗战文化队伍必须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也决定着抗战文化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由此,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改建党初期对待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的错误政策,明确提出了“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2]的观点,甚至制订了与国民党“抢”知识分子的政策,因为“抢得慢就没有了”^[3]。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详细规定了对待文化人的具体政策。该指示指出,一定要“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的使用,使他们写作的积极性能够最大的发挥”^[4],同时,“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为的限制与干涉。我们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4]。周恩来曾三次到桂林,首先争取桂系对抗战文化的支持,从而为文化人开展抗战宣传创造了前提条件;其次,十分重视关心文化人的生活和安全问题;再次,组织并领导救亡团体,从而巩固并扩大了广泛持久的桂林文化界统一战线。

桂林尽管是在国统区,但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却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里。这在当时来说,不能不说

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这是因为中共非常巧妙地融合各种抗战文化资源,注重团结各阶级、阶层、爱国民主人士和国外侨胞,还包括反战的国际民主人士,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和进步文化,使其成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主流。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是中共在桂林开展统战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核心组织,巧妙地利用国民党中央与广西地方之间的矛盾以及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隔阂,巧妙地采用灵活多样的文化形式和体裁,卓有成效地在迂回曲折中开展抗战文化运动。尤其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桂林出版物的审查制度像在整个国统区一样变得更为严厉。于是桂林进步文化人在中共领导下,更需要以巧妙方式应对,他们多以杂文形式或以历史题材小说、戏剧形式表现时代心声,因为这样容易通过“书审”。正如田汉所说:“有许多东西是不能正面去写的,不得已只好借重历史事实反映今天的事件。”^[5]

二、在抗战文化发展过程中锻造了一支生机勃勃的文化队伍

由于战时的特殊情势,桂林集聚了大批文化人和青年学生,从而具有了一定规模,所以才称得上“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6]毛泽东所说的“鲁总司令的军队”就是指以鲁迅为旗帜的“文化的军队”。由于当时桂林处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大批文化人从上海、武汉、长沙和粤港等地汇聚到桂林。据统计,从1938年10月到1944年6月,先后内迁到桂林的文化人士多达1000多人,其中比较知名的文化人士近200人^[7]。

之所以说这是一支生机勃勃的队伍,是因为他们积极为抗战救国鼓与呼,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抗战运动的进程,而且他们自身也在抗战文化发展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实现了“改造者被改造”,从而把自己锻造成了一支生机勃勃的具有先进思想的文化队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抗战时期,这些文化人尽管身份来源各异,教育背景不一,思想信仰、政治信念有所不同,但在延安和桂林两地的抗战文化运动中,爱国主义这面旗帜把这些来自各阶级各阶层文化人和青年学生以及广大民众凝聚起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成为推动抗战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力量源泉。二是他们在抗战文化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坚定的革命文化观。近代的中国,历经磨难。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历史使命感的文化人在苦闷彷徨中看到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从中看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的前途,找到了解救中国的武器——马克思主义。而且,国民党的专制和不抵抗,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恶,更加坚定了文化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三是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为抗日战争默默奉献,不讲个人得失,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当时桂林人口由1937年的8万人激增到1943年底的30万人,加之日军飞机的轮番轰炸,使桂林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当时活跃在桂林的文化人中,艾芜“家中有几个小孩在闹着要东西吃,每天,他右手携着布袋,穿着破旧的蓝布长衫,佝偻着腰,进城向朋友借钱买米”。王鲁彦“一年多的病床生活把他折磨得只剩下一把瘦骨”,贫病交加的折磨竟使他病逝于桂林^[7]。茅盾从香港撤到桂林后仅找到几平米的斗室居住。西南剧展“会歌”更是体现了当时文化人忍饥挨饿也要开展抗战文化活动的艰苦奋斗精神,“忍着饥,耐着寒,倍历创伤;流过汗,流过血,还有死亡!为的是:团结!奋起!为的是:自由解放!”

三、积极拓展文化阵地并繁荣文化事业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拓展文化阵地和繁荣文化事业的重要性。因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两地文化人都积极拓展文化阵地以开展抗战文化和传播革命思想,他们创办各种报刊杂志、出版社、书店,开展戏剧活动和“文章下乡入伍”活动等,从而在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相对比较繁荣的文化事业。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指示国统区党组织“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8]。因此,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桂林先后创办了很多进步出版社、报社、书店和印刷厂,主要有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华日报》桂林报馆、文化供应社、南方出版社、生活教育社、西南印刷厂、建设印刷厂和三户印刷厂等。1942年桂林书业公会登记过的大小书店和出版社共有79家。著名出版家赵家璧曾说,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书刊,有80%是在桂林出版的。这些出版社和书店出版营销的书刊以宣传抗战文化和进步思想为主导,还编译出版发行有关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著作。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出版发行了《论持久战》;文化供应社出版发行了《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秦记西南印刷厂印刷;《论新阶段》、《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和《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等由《新华日报》桂林报馆印刷发行。另外,桂林的《救亡日报》和《国民公论》也经常刊登毛泽东的著作。《救亡日报》最早于1937年8月在上海创刊,1939年1月10日在桂林复刊。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统一战线报纸。在周恩来指示下,该报以宣传抗日为宗旨,成为“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

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1939年1月1日,由张铁生、胡愈之等主编的《国民公论》由武汉迁往桂林出版,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综合性时事政治刊物。这些书店和出版社还将其出版物运往沦陷区和粤港南洋地区,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抗战文化发展。无论是在大后方,还是在沦陷区,都非常成功地推动了抗战文化发展,也卓有成效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大众化,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另外,桂林还创建了不少文化团体,并与延安和武汉等地的文化团体在呼应互动中为促进抗战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成为当时影响最广泛、最具号召力的全国性抗战文化团体,凝聚了大批文化名流。广州、成都、昆明、桂林、香港、延安、贵阳、曲江、上海等地先后成立了分会。1938年3月30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武汉成立,其宗旨就是团结青年新闻记者,促进抗日宣传。重庆、桂林、昆明等地记者相继成立了分会。除此之外,其他的全国性文化团体也相继建立。这些文化团体先后在延安和桂林设立了分会,他们通过举行各种专题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等途径发展抗战文化运动,而且团结了不同阶级、阶层和流派的文化人。

除了上述全国性的文化团体,桂林也组建了很多地方性文化团体和群众性抗日团体。1940年2月,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这一消息传到桂林后,鼓舞推动了广西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广西宪政促进会于1940年5月成立,成立后即与延安宪政促进会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对遏止蒋介石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桂林文化人组建的文化团体有20多个,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广西建设研究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抗敌演剧队、中华职业教育社、新中国剧社、国际新闻社等。

四、桂林抗战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得益彰

抗战时期,桂林尽管处于国统区,但是抗战文化运动始终由共产党领导,以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导。桂林文化人在广泛开展抗战文化运动的同时,更是积极扩大对马克思主义各方面进行大众化研究和宣传,创造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果,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为动员和武装民众参加抗战起到了巨大作用,使更多的文化人和进步学生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并积极参加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在其指导下进行的理论实践,使各抗日力量在思想上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不仅促进了抗日救亡,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较有成效地实现了大众化。因此,桂林抗战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到了相得益彰的发展效果。

首先,在中共的领导下,桂林文化人创建合法阵地公开或半公开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先后创建的合法阵地有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文化供应社、三户印刷厂等。这些出版社和书店出版发行了不少马列著作,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都得以在桂林出版和传播。《救亡日报》、《国民公论》和国际新闻社等也经常以社论、时论和消息的形式宣传中共的抗战政策和主张。

其次,利用国民党学校和研究机构及部分舆论阵地介绍宣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思想。杨东莼、陈此生等早在1932年就开始在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公开宣讲马列主义,杨东莼本人主讲“唯物辩证法”,薛暮桥主讲“政治经济学”,陈望道、羊枣(即杨潮)、施复亮、邓初民等都在此讲过马列主义相关课程。杨东莼后来又于1938年返桂出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开设“抗战形势讲话”、“中国近百年史”等课程,其实是着重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所包含的思想观点。李达于1938年春应广西大学校长白鹏飞聘请到桂林,给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这种在国统区的大学讲堂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在当时较为少有。当时还成立了不少读书会或读书小组传播革命思想,引导青年学生靠近马克思主义。《大公报》及其副刊《文艺》、《广西日报》、《西南青年》、《广西妇女》等都曾一度为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文化人所主持或担任主笔,积极宣传进步文化和思想。

再次,文艺界在开展“文艺的民族形式大讨论”和“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等活动中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中国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后,延安文艺界开展了“文艺的民族形式”大讨论,开展“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活动。这些讨论和活动很快得到了桂林、重庆和昆明等地的呼应,但以桂林响应最早、持续时间最长。1939年10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一成立就召开座谈会,组织通俗文艺研究,并开办讲习班,讨论文

艺上的中国化大众化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黄药眠发表了《文艺上之中国化和大众化问题》,林山发表了《关于运用民族文艺形式的意见和尝试》和《到大众中去——给桂林的诗歌工作者》等,他们还编辑出版了不少通俗刊物,如《文艺生活》、《新道理》、《当代文艺》、《青年文艺》、《新水浒》、《人世间》等。这一讨论持续了近四年,直至1942年。他们还开展了具有广泛影响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活动。同时,桂林还出现了街头诗、街头画、街头剧、木偶戏等大众化文化形式;街头剧和活报剧演出、街头画展、露天歌咏会、星期歌咏会等通俗化的群众文化活也都经常可见。

此外,桂林还是延安、上海、香港和重庆等地进步出版物的集散地。当时不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读物从上海或延安传到桂林,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辩证唯物论入门》、狄超白的《通俗经济学讲话》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

五、桂林抗战文化发展经验与启示

(一)中共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了抗战文化的蓬勃发展,使爱国主义在抗战文化运动中得到充分张扬,但也注重引导抗战文化超越了爱国主义文化的范畴,使其朝着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方向前进。在抗战文化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抗战文化运动,始终坚持先进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正确方向。对弘扬时代主旋律的文化活动给以鼓舞和支持,对日本的愚民文化加以揭露,对国民党内的专制文化和投降文化给予坚决抵制。在党的抗战文化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各阶层进步文化界人士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战文化活动,一大批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作品构成了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旋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史学、文学艺术、军事学等各领域都得到了充分传播,不仅使文化人自身实现了“改造者被改造”,也使广大民众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同了马克思主义。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成为团结一切抗战力量的精神武器,为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凝聚了巨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抗战局势中成功引领抗战文化朝着先进文化方向发展的经验值得借鉴。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文化多元化和价值观逐步多元化。面对新的趋势,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作用,唱响时代主旋律。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要建设先进文化,必须尽可能拓展并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正如江泽民所说:“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9]

(二)中共“文武两个战线”的配合作用

当时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对比注定抗日战争必将是全民族的战争,这也决定了抗日战争离不开抗战文化的动员。所以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抗战文化的重要配合作用,并据此适时地制定出了顺应抗战发展的“文武两个战线”配合作战的政策。

193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指出:“现在我们要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10]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进一步阐明了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11]

为了充分发挥国统区“文武两个战线”的配合作用,中共中央于1940年9月10日在《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专门强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因此,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敌占大城市亦然)应对发展文化运动特别提起注意,应把对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8]

就是因为中共一直注重“文武两个战线”的配合作用,所以才一改对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政策,领导文化人全面而又巧妙地积极拓展文化阵地,形成最广泛的文化界统一战线。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12]

由于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具有相当规模且独具特色的文化统一战线,不仅凝聚并形成了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群体,而且在他们周围又团结和联系了更多处于中间状态的进步文化人,而且形成了这

两大群体并肩作战、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尽管它没有统一的名称,各团体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但都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各级党组织的指导,组织革命文艺理论的讨论,批判国民党文化政策,同各种错误思潮作论辩,研究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有效地扩大了先进文化思想的传播。

同时,由于形成了广泛的文化界统一战线,形成了陕甘宁边区、国统区、沦陷区、粤港南洋等几大场域间文化人群体遥相呼应、相互扶持的工作格局,终于打破了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及共产党和红军长达十年的严密的新闻封锁,揭穿了国民党对共产党和毛泽东以及红军和边区民众的造谣污蔑,使得国内外都逐渐看清楚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的真相,为延安和中国共产党争得了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感和支持,也赢得了海外华侨对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认同和援助。总而言之,“国民党想要永远一手遮天,已经困难了”^[6]。

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同样是统一战线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目前在全国3800万专业知识分子当中,约有1000万在非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其中有不少党外知识分子。他们来源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知识背景、不同派别。所以,当代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复杂的“异质性”的群体。但是,不论其价值观、政治取向、专业领域如何千差万别,他们对民族复兴和国家繁荣的追求是一致的。他们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们的社会角色、社会影响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这足以说明,今天中国共产党应总结抗战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成功经验,综合考虑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和知识分子队伍出现的新特点,制定和实行科学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注意保障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让人人都能看得见摸得着,这样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说:“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是保证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之举。”所以说,建立新时期文化界统一战线,使各行业各阶层各地区各派别知识分子及时广泛地开展群众性活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教育。这对于凝聚人心、统一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新时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中共非权力性影响力的渗透作用

正如上文所述,桂林与延安在抗战文化运动方面不但各自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效,而且也取得了良好的互动效果。这里必须提出的是,这些成绩的取得并非中国共产党强制力约束的结果,而是其非权力性影响力的结果。这种非权力性影响力主要表现为示范力、感召力、吸引力、渗透力,是一种隐性软性力。但是,它的效力却远远大于行政约束力。当时,包括各党派各方面的,甚至还有来自南洋各地的进步文化人和青年学生都能汇聚到中国共产党的周围,靠的绝不是强制约束力,而是非权力性影响力,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那么,这种影响力之所以如此之大,就在于它是建立在令人信服的基础之上。当时这些进步文化人和青年学生都是自觉自愿汇聚到共产党身边,并竭尽全力为中国抗战奔走呼号。

非权力性影响力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文化人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历史使命感。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历史使命感,这种由几千年文明积淀下来的价值取向总是促使着他们走在历史的最前头,自觉担负拯救民族的重任,甘做为民族解放呐喊战斗的文化大军^[13]。“从这一个时刻起,几乎每一个有良知、有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像受雷击一般从惊恐中跃起,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中去”^[14]。

其次,中国共产党真心爱护和保护文化人和进步青年学生,把他们当做瑰宝予以保护。卢沟桥事变后,周恩来亲自安排在上海的宋庆龄、恽逸群及在武汉的茅盾等赴港,对那些小有名气的知识青年,中共在港组织则通过各种途径给予关怀。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的国内政治形势更加恶化,文化界形势也随之更加艰难,尤其在国统区的重庆、桂林和昆明等地为甚。对此,周恩来同样给予最大的关怀,组织南方局把一百多位知名文化人转移到香港。然而,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日军即进攻香港,25日就占领港九,在这危难之际,中共紧急部署“秘密大营救”,共抢救出进步文化人士及其家属约三四百人至桂林,而且接应了数千名回内地参加抗战的青年学生^[15]。由此可见,在历次严峻的历史关头,中共竭尽全力抢救进步文化人士,体现了中共对文化人的深切爱护,使文化人亲身感受到共产党人在危难之际是怎样把他们当做国家精英和瑰宝而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营救,更使他们亲身感受到国共两党对待文化人的天壤之别的态度,

无疑加深了文化人对中共的信赖和尊敬。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身体力行而形成的非权力性影响力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胡愈之. 在桂林文化供应社的回忆//广西军区政治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M]. 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187.
- [2]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3.
- [3] 陈云文选(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1.
- [4] 张闻天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90. 291.
- [5] 田汉. 一九四一年文艺运动的检讨[J]. 文艺生活,1941,1(5).
- [6] 胡乔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57. 333.
- [7] 魏华龄. 桂林抗战文化史[M].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18. 41.
- [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488.
- [9]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7.
- [10]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61.
- [1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47.
- [1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9.
- [13] 艾思奇. “新启蒙运动”座谈[J]. 读书月报(创刊号),1937(5).
- [14] 徐州师范学院. 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309.
- [15] 袁小伦. 粤港抗战文化史论稿[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170.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of Guilin Culture of Anti-Japanese War

GUO Deqin

(School of Marxism,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P. R.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Guilin culture of Anti-Japanese War had been booming, and got rich experience. The first is the correct and skillful leadership of CCP. The second,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the Anti-Japanese culture, a vigorous cultural team was formed, and this team actively expanded cultural position and focused on the flourishing of culture. The third, the culture of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had developed each other. Thus, we think that CCP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leading role in developing advanced culture at any time, focusing on the coordination of civil and military fronts, and making full use of the non-power penetration of CCP.

Key words: Guilin culture of Anti-Japanese War;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tellectuals

(责任编辑 彭建国)